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Nanjing Datushashi Yanjiu

(增订版)

下

张生 等 著



凤凰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Nanjing Datushashi Yanjiu

(增订版)

张生 等 著

下

四、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视角”

——以德国外交档案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的德国,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朋友,尽管在希特勒眼中,两国份量并不一致。一方面,日本是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盟友,双方有着共同的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与德国保持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当时,德国军事顾问继续协助蒋介石组织对日抗战,中、德军火贸易畅旺。对德国来说,如果可能,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是最好的选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驻日大使迪克森在中、日间居间调停,正是此种定位的产物。这种非逻辑却又现实的角色,是德国人士看待中、日冲突角度独特的重要背景,其价值因而彰显。

当日军在1937年11月底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德国在南京保留了以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Rosen)为首的外交人员班子,此外,数位德国商务人士因为参与国际安全区工作而拒绝奉命离开。他们与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英美等国的外交人员、西方媒体记者等一起,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目击者,国际联合救助行动的合作者。还有其他一些德国人,或与在南京的德国人有着工作关系或私人友谊,或通过其他途径,不同程度地获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本书所说的“德国视角”,是指以外交人员为主体的德国人群体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记述和分析,这是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极有特色的文本。本文试图主要依据德国外交部档案,通过对这一文本及关联问题的解剖,发掘其中包含的历史意义。

(一)“德国视角”的人员组成

陶德曼(Trautmann),德国驻华大使,11月25日从南京转移到汉口。从1937年10月22日开始,他忙于在中日间充当调停人。调停的过程,使陶德曼形成了对于日本的强烈愤慨。1938年1月11日,他致电德国外交部称:

日本通过我方二度修改其和平条件,此项修改条件由我方传达中国,实在是一种“无耻的陷阱”,事实上,日本在玩弄我方,致使我们在中国政府面前已经颜面扫地。^①

陶德曼在南京沦陷前前往武汉。此前日军对南京的无差别轰炸,是令人担心的征兆。好在日本是德国的友邦,而“德意志”3个字对日军士兵有一定的威慑力^②,他不用太担心德国留宁人士的生命安全。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而言,他本可以迎合希特勒的意旨,用职权要求罗森等人与日本方面合作,但他不断地将罗森、沙尔芬贝格等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述发往德国外交部,同时自己也作出不利于日本的总结和判断。当然,作为大使,他的重点是分析中日冲突对远东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及德国的应对之策。

罗森,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日军进城前夕,他去南京江面英国军舰上避难,中间在日本军舰的护送下去了上海,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1945年9月11日,他致函中国驻美大使:

写此信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能注意到在德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发现的丰富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材料……

有许多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期间我在南京写的报告,当时我被留下来负责德国大使馆直到我被召回并撤职(在1938年6月),其间有数周我在Hangtze的英国船上度过,当我在上海领事馆短暂逗留时,我口述写下了对一些事件的报告(美国“巴奈”^③号船的沉没)。我还由我在南京朋友梅奇^④做了许多报告,他现在华盛顿特区。^⑤

罗森与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等在英国舰船上时,亲眼目睹日军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和严重后果,他对日军的厌恶立即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而且由于他坚持要到南京各处观察大屠杀的惨景,日本方面对其十分忌讳。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福田笃泰曾很纳闷地问沙尔芬贝格:“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

① [美]James. T. C. Liu《抗战初期德国居中调停之经过》,段培龙译,《传记文学》第34卷第4期,第50页。

② 拉贝1937年12月17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57—158页。

③ 也译巴纳、帕奈或帕莱。

④ 即约翰·马吉。

⑤ 《德国原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致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函》(1945年9月11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3页。

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①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可以看到,日本领事馆和军方数次安排内容丰富的宴会,其中包括佐酒的美艳艺妓,企图赢得罗森的好感和“合作”,但罗森仍不放弃,直到被召回撤职。人以群分,罗森在南京很处得来的同行是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爱利生,后者因为对日军士兵“不敬”被打了耳光,酿成著名的国际外交事件。

沙尔芬贝格(Scharffenberg),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主管,他很后悔与罗森避难于英国军舰上,认为此举“差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②。回南京后,他对日本方面企图用“公关技巧”掩盖暴行的做法深恶痛绝。1938年2月8日,日本领事馆再次招待南京的外交人士,“演完4个节目后休息。幕间休息的走廊里摆满了小吃,长餐桌上有蛋糕、甜食、糕饼、水果等等,弯弯曲曲地像是俄罗斯皇帝的专用食品。所有食品放得整整齐齐。艺妓又来上茶,特别是点烟时那迷人的姿势,引得众多摄影师挤过来拍照摄影,以便过后通过电影或报纸向不明情况的世人表明南京的日本人和外国人相处得多么和谐。”沙尔芬贝格评论道:“这完全是一枚勋章的反面。露出了马脚!”沙尔芬贝格的厌恶源于他对日军残暴本性的发现,他向陶德曼报告说:“几天前就从施罗德博士住房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捞出了12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的双手都被用铁丝捆绑着。拉贝先生亲眼看到过这事。附带说一句:我自己多次看到日本士兵还用饭盒从这个水塘里取水喝。但愿他们吃得香!”^③

拉贝(John H.D.Rabe),西门子洋行经理,国际安全区主席,一直在南京。由于担任过如此重要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④。1908年,拉贝到中国,中间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他在中国生活30年。拉贝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的人,1938年3月他被西门子公司召回,其时,他刚刚救助了数以万计的在日军铁蹄下辗转求生的中国人。在他将反映日军暴行的报告寄给希特勒后,盖世太保强迫他保持沉默^⑤,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拉贝视角的震撼性。

爱德华·施佩林(Eduard Sperling),德国上海保险公司员工,国际安全区总稽查,一直在南京。1937年12月12日,他曾自告奋勇要在中日间斡旋停火,以便中国军队后撤,日军和平进入^⑥。1938年1月10日,滞留在南京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

① 《沙尔芬贝格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1页。

② 《沙尔芬贝格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4页。

③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2月23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18/2081/38。

④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拉贝日记》,第599页。

⑤ [德]拉贝:《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又回到了家》,[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588页。

⑥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1011/38。

的蒋公毅去访问他,施佩林拿出中国地图,严肃地说:“现在敌人占领的,在贵国全面积中,不过百分之几,你们唯一的出路,只有抵抗,否则恐怕要做奴隶!”^①施佩林的直率,透露着对中国的同情与期望,同时,又带着一股德意志式的冷酷与肃穆。

克勒格尔(Christian Kröger),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国际安全区官员,一直在南京。克勒格尔第一次接触日军是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在已经变为伤兵医院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日军军官在短暂的视察后表现出了“非常善意”的态度,给克勒格尔的印象是:日军很守纪律。“遗憾的是这种印象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到14日,“情况急剧恶化了”,日军的暴行在某种意义上使克勒格尔想起了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②。

京特(Karl Günther),旅居唐山的德国侨民。南京沦陷前,即将建成的江南水泥公司天津董事会聘请卡尔·京特,佯作德国禅臣洋行的代表,前往南京以第三国人士身份保护厂矿不被日军侵占。他们同时商请丹麦F.L.史密斯公司亦派员前往,后者派出旅沪丹麦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京特和辛德贝格到厂后,在厂内升起德、丹国旗,建立了难民营,保护了1万余名中国百姓。京特曾数次穿梭于江南水泥厂与南京城区,将难民营和郊区民众反映日军暴行的书信转交给城内西方人士,协助马吉拍摄了有关记录影片,还为营养匮乏的城内西方人士带去食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京特本人也保存了不少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图片资料^③。

菲舍尔(Fischer),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时在上海。尽管他本人在上海对松井石根并不客气,可他对罗森等人目击日军暴行所产生的强烈愤慨确实存在隔阂。他告诫罗森:“不能不考虑到军事占领这个事实。众所周知,凡是军事上必须的,军方绝对不会允许对此进行讨论。”显然,他并不清楚,罗森等人目睹的屠杀、强奸、抢劫、纵火等暴行并不是“军事上必须的”,他要求罗森对日本人“暂时保持友好的节制”^④。

劳腾施拉格尔(Lautenschlager),德国驻华使馆参赞,时在汉口。作为沙尔芬贝格的好朋友,在沙尔芬贝格没有看清日军的面目之前,他听到不少对罗森和拉贝的指责。比如,“前几天罗森又和拉贝一起坐拉贝的车在没有宪兵随行的情况下离开了大使馆。本乡少校(佐)严厉地警告了拉贝,并委托他转告罗森,不要再在没有宪兵随行的情况下外出。许尔特尔、我和其他的德国人在大使馆前都很有礼貌地跟宪兵和门卫打招呼,但罗森对两者连看都不看一眼。那副样子简直就像他愤怒的矛头是对准

① 蒋公毅:《陷京三月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3—84页。

② 《外交资料:克勒格尔的私人报告》(1938年1月13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无。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18—320页。

③ 京特的事迹由《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戴袁支先生提供。

④ 《菲舍尔致罗森的信函》(1938年1月21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无。

全体日军的一样。……罗森在协商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拉贝和我面前像平时一样愤慨地说道:“和菲舍尔在上海对待松井的态度一样,我也不打算和这些杀人犯们同坐一张桌子。”^①事实上,拉贝对罗森拒绝日军派卫兵跟随他们外出不以为然,他认为罗森这种不与日军合作的态度可能“不讨喜”,而且影响他们与日军交涉^②。但拉贝和劳腾施拉格尔的关系可能并不坏,他曾临时替劳腾施拉格尔担任过国社党地方组织负责人^③。

奈贝尔(Willy Noeble),德国驻日使馆参赞,时在日本。他从日本方面观察南京大屠杀及其后果的深刻性令人难忘,他说:“不管怎么样,外国政府和国际舆论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现实。日本的参謀本部由于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文官势力主导的团体在意见上发生了冲突而败下阵来。”“看来似乎是由于松井大将专横独断的行动,不仅导致了与在上海的列强的冲突,还导致了与东京日本政府的冲突,最终他成了自己的牺牲品。这种做法可能也有安抚对松井体制日渐不满的英国的意图。不过松井被召回并不一定意味着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替罪羊。”^④

另有德国驻日大使冯·迪克森(Dirksen),退休中校布林克曼、南京北方饭店经理黑姆佩尔(Hempel)、德国外交部副部长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acker)德国驻华使馆参赞毕达、德国公民H·斯托尔滕贝格-莱尔希等也是德国视角的组成部分。

德国视角的严谨性是其价值的重要基础,日本学者横山宏章称:《拉贝日记》“对南京大屠杀的论争方向具有绝大影响力”,是“超一级资料”,因为如此,德国视角是日本右翼最感痛苦的证词之一,反复攻击其证明力而无法得逞^⑤。其严谨的特点同时使我们有机会注意到:日本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掩盖早在屠杀过程中即已开始。1938年3月10日,国社党党员H·斯托尔滕贝格-莱尔希致信德国驻广东副总领事肯佩(亦为国社党党员),该信讽刺《德国简讯邮报》所登载的日本空军上尉T.H.所写的《中国前线上空的空战》是“多么特别的宣传读物”,莱尔希分析指出,该上尉“在文章中关于广东写道:从欧洲人居住地的网球场向上开了火。就是说,有人从那里朝他打了炮(!!),美国炮艇的大炮瞄准了上空。在早几天的文章中另一个地方,这位作者

① 《沙尔芬贝格给劳腾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1—362页。

② 拉贝1938年1月28、30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431、442—443页。

③ [德]埃尔夫温·维克特:《约翰·拉贝其人》,[德]拉贝:《拉贝日记》,第596页。

④ 《德国驻日大使馆参事官奈贝尔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3月3日),文号:534/38。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427、429页。

⑤ 《〈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对〈真相·南京事件——检验拉贝日记〉的检验》,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5—168页。

称——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击沉‘巴纳’号道歉——,从飞机上无法认清炮艇的国旗(人所共知,国旗的宽度足有遮阳篷布那么大)。但他却看见了细长炮筒的位置!?!然后他听到通常是在飞机出现前15分钟才拉响的警报,‘在紧靠屋顶的上方飞了过去’。而作为这里的目击证人的我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认出天空中的那些小小黑点。这一切令人觉得不能不怀疑该文章的真实性。”他为德国媒体居然登载这样的文章感到可悲^①。莱尔希还给同在广东的德国外交官阿尔滕布格(Altenburg)指出了另一个例子,这位日军上尉还写道:南京“居民们纷纷逃到长江另一边的浦口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送过江去。大桥已不再用得上了。”阿尔滕布格就日军居然臆造出长江大桥这等富有远见的行为向德国外交部提出:“如果德国报纸的政治方向是出于伟大的政治考虑,必须对日本在中国的行为给予理解和同情,那这里的德国人只得对此保持缄默。但这里的人从不会明白的是一再重复纯粹的谎言以及愚蠢的捏造,德国公众对此其实是不该见到的。”^②陶德曼随后也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他已经提醒多次,这样公然撒谎、捏造的报道不应该出现在德国媒体上^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德国人士均以维护德国利益为己任,均对遭受劫难的中国人抱有深刻的同情,但“德国视角”内部存在存在分歧,像拉贝这样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对施佩林这样的“老粗”也介入历史记录,颇为戏谑。但最大的矛盾,存在于罗森和沙尔芬贝格之间。沙尔芬贝格坦率地说,在罗森手下工作,他没有感觉到愉快。沙尔芬贝格认为罗森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态度并不明智,一开始,他认为,与他们打交道的日本人中有彬彬有礼的绅士,爱利生遭遇的羞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而罗森若非日军懵然,“可能会被打两三个嘴巴”。他说:“自从我们回到该地(按:指南京)以来,由于他充满敌意的反日态度,情况一天天变得严峻起来。”^④罗森在日本外交官面前反复提起日军暴行,被沙尔芬贝格认为是“老黄历”。他同时认为英美人士在罗森的愤怒中起了特殊作用:“和他协商各种事情的英国和美国的同行不仅没有制止罗森的任意妄为,反而火上浇油。”^⑤沙尔芬贝格认为,“罗森的攻击性态度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任何好处”,他说拉贝跟他是同样的认识,而且暗示,罗森接受英美外交官

① 《1938年3月10日的报告附件》(1938年3月1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编号:240/948/38。

② 《阿尔滕布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3月1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编号:240/948/38。

③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3月12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2452/38。

④ 《沙尔芬贝格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0、362页。

⑤ 《沙尔芬贝格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2页。

的聚餐邀请、而拒绝答谢日本方面的招待,“日本方面迟早会知道”^①。沙尔芬贝格显然以为释放善意会得到日军的善意回应,但很快,他本人开始认识到日军的残暴及其本质,一系列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报告出自其笔下。沙尔芬贝格的前后变化,在认识论上更具历史研究价值。

德国视角内部的交流与传播,一是以外交电文、信函为媒介,即留京德国人士和在外地的德国人士之间,主要涉及南京、汉口、上海、东京、柏林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并延伸到广州、伦敦、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地。其中,南京是素材性信息收集中心,汉口是对策中心,上海是素材外流到国际社会的主要管道;二是人员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局限于居留南京的人士,从现有的材料看,他们之间的互相补充和证明,充实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录。

(二)“德国视角”的核心: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德国人士近距离观察南京大屠杀之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开始。这些观察者,有些就是纳粹党员,像拉贝和施佩林,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纳粹在欧洲的暴行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对日军的暴行加以“中世纪式残暴”的评语。而且,从现有资料看,德国人在国际上较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杀”(Nankinger Massacre)一词^②。

拉贝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德国人中,对南京大屠杀做出最详尽记录的。《拉贝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日军在南京每一种类型的罪恶几乎都可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对应的案例。作为主席,他需要关心数十万难民的生计,需要日本方面哪怕表面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作。而且,由于天天目击日军暴行,或看到有关报告,拉贝感到厌恶,他倾向于删除安全区官员报告中那些令人反胃的文字。施佩林在报告中提到:“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拉贝认为这样的句子应该删除^③,所以拉贝对于日军暴行的记述几乎超人地“平静”——在他的日记中几乎看不到形容词。

1937年12月13日,拉贝等将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楼

① 《沙尔芬贝格寄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4—365页。

② 毕达:《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1937年12月3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4279/37。

③ 拉贝1938年1月22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478页。

里,日军将其中的400—500名强行拖走杀害。拉贝“被这种做法惊呆了”^①。第一次的震惊很快被长期的噩梦所取代——日军将一个中国兵绑在竹床上杀害后扔在拉贝居所附近一直没有埋葬,在其后6周中,这具尸体成了日军对拉贝的一个威胁性提示,告诉他12月13日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果然,12月17日,拉贝记述道,16日夜仅安全区有1000个女性被强奸^②;12月22日,拉贝记述道:在安全区的池塘里发现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其中一个池塘就有30具,他们大部分被反绑双手,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石块。下关发电厂的43名工人被押到江边枪杀,理由是该厂曾经是国营工厂^③。由于对下关至燕子矶一带的大屠杀并不知情,1月3日,拉贝诚实地记述到:有关6万中国人被俘或被杀的事,他并不知道,他担心有2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和数千平民被杀,他祈祷:“但愿就这么多了。”^④然而,1938年1月7日,他记述道,1个妇女因全家其余17个亲人被杀,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疯跑,另一个妇女的父母和3个孩子被杀,她用最后的钱买了棺木,日本人抢去棺木,并给出理由说:中国人不必被收殓^⑤。1月25日,他记述道,一个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了一天的活疲惫地回到家中,妻子端上几碗稀饭,全家6口就指望着这顿饭,一个日本兵过来,在碗里撒了一泡尿,扬长而去^⑥。2月7日,拉贝等在西康路附近的两个水塘里捞出124具中国人尸体,都被日本人用铁丝反绑了双手,他们先被机枪扫射,后被浇上汽油焚烧,因为要节约汽油,日军将他们烧得半焦后扔进了水塘^⑦。

拉贝平静地说:“人们也许 would 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⑧他同时为中国人的逆来顺受而痛心,但这种痛心也是平静的:“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⑨拉贝终于因为无休止的苦难而身心疲惫,他希望脱离南京这个让人类对自己的同类失去信心的悲剧舞台。回国前夕,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3000妇女哭喊着包围了拉贝的汽车,他默默地下了车,径直步行离开他担任主席的难民区。当然,乘英国“蜜蜂”号炮艇离开时,他将一位一直隐匿在他家的中国空军机长伪装成自己的仆人带出了

① 拉贝1937年12月14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38页。

② 拉贝1937年12月17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56页。

③ 拉贝1937年12月22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203页。

④ 拉贝1938年1月3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269页。

⑤ 拉贝1938年1月7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307页。

⑥ 拉贝1938年1月25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417页。

⑦ 拉贝1938年2月7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490页。

⑧ 拉贝1938年1月22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395页。

⑨ 拉贝1938年1月25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504页。

艾拉培光重
濟強扶危
佛心俠骨
共祝天庥
仰爾戡穀
一九三八年一月
本院韓氏公啟

在拉贝家避难的难民给拉贝的写在红绸布上的感激之词。选自《拉贝日记》。



日军在安全区内搜捕“败残兵”。选自《历史图像》。



安全区难民营一角。选自《历史图像》。



安全区内被日军搜捕出的青壮年市民。选自《一亿人的昭和史》。吴先斌提供。



1938年3月,南京郊外栖霞山的难民窝棚。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

南京^①。

罗森在日军进城前受邀登上南京附近江面上的英国轮船,这使他有可能会稍微离开南京城中发生的暴行。但日军就在他眼皮底下用特有的方式作了提醒:“(12月12日)上午时分,在我们附近的拖轮和浮船上的日本步兵先是按照他们在陆地和帆船上的习惯杀死了几个无辜的平民”,接着,罗森和英国官员要求返回南京的要求被拒绝了,“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不想让我们看到毫无纪律可言的日本部队对南京平民百姓奸淫、烧杀和抢掠的可怕景象。”12月21日,罗森乘坐英国军舰前往上海,经过下关时,罗森“除了见到严重的破坏情况外,还见到了好多堆尸体——尸体穿的都是平民衣服”^②。

1938年1月9日,德国驻南京办事处恢复工作。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提到,当外交人士提出重返南京后,日军立即着手清除尸体。但这样一个在世界近代史上没有先例的屠杀,规模实在太太,持续时间太长,日军无法完全消灭他们的罪证。罗森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妇女遭受的苦难是最令罗森痛苦的:“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事、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③

日本人攻陷南京后,显然认为中国必将求和,曾很无顾忌地告诉西方人士一些“秘密”,很不巧,罗森也知道这些“秘密”,并将其写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罗森在英国军舰“蜜蜂”号上避难,“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英国海军上将(按:应为少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按:应指八卦洲)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

① 拉贝 1938 年 2 月 22 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 571 页。

②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7 年 12 月 24 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8432/37。

③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 年 1 月 15 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 146—149 页。

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①事实上,从下关到燕子矶的长江沿岸,正是日军屠杀国民党徒手官兵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相当数量的遇难者无法精确统计的原因。罗森对八卦洲屠杀的记载,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罗森在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时,体现了与拉贝一样的严谨。当约翰·马吉拍摄出那部著名的电影记录片时,他到实地进行了考察。“我也亲自去了现场,察看了最近这个星期日日本一系列英雄行为之一的4个牺牲者。在那里看到一位老人,背着两把椅子,被一个日本兵毫无顾忌地用枪击伤。他妹妹在日本人到来时藏在附近,并叫来了两个熟人。这两个人利用一扇门、两个竹竿和一些粗绳捆扎成一副担架。他们准备把这位受重伤的老人抬走。日本人见状把这4人全部枪杀:受伤老人、老人的妹妹和两个抬担架者。”^②

沙尔芬贝格的风格跟罗森不同,但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并不逊于罗森。而随着日军暴行的积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像日本人的“政治犯”,或者,日本人是猫,而他却像躲在洞里的老鼠^③。等到1938年2月15日,主张在日本军方的限制下保持忍耐的沙尔芬贝格终于被允许进入中山陵地区,沿途所见给他上了一课。“我们一直到了游泳池。宝塔附近马路上美丽的垂柳全被砍光了,几乎所有的别墅都已烧光。我们无法进入这个地区,因为到处还有许多零星的尸体,已经发黑,被狗咬得残缺不全。”而被尸臭熏染下的南京城,处在非常危险的卫生状况中,“现在天气变化很大,像今天天气就很热,因为尸臭人们都不能上街。”^④

连被“恩准”参观的中山陵地区都遗留大量屠杀的证据,显然不符合日军要给外国人士留下好印象的要求,清理尸体的工作于是加快了。3月4日,沙尔芬贝格报告陶德曼:“把尸体从城里运走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现在红卍字协会已经获得准许把30000具尸体埋在下关,每天掩埋600具。尸体用草席包裹,只有两条腿露在外面,草席包里放有石灰,然后用车运走,埋在万人墓里,同样加进了石灰。据说已埋葬了约1万具尸体。”^⑤

克勒格尔的汽车被日军抢走,仆人被刺刀威胁着开了门,交出了所有的东西。更严重的事情是,他的门口在数周时间内一直放着3具尸体。1937年12月28日,克勒

①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1011/38。

②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55页。

③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3月22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18/2608/38。

④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2月28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18/2174/38。

⑤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3月22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18/2608/38。

格尔在屠杀高潮期就开车去栖霞山察看日军在当地的暴行,发现日军“以‘歼灭中共士兵’为口号,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农民不加区别地枪杀在田里”,但他谦逊地坦承自己“没有勇气逞英雄”。

他看到日军抢劫、杀人、奸淫的暴行:

打仗的士兵和因为猛攻而给养不充足的部队被放进了城内,他们对赤贫的居民和无辜的民众进行了此前谁也没有预想过的残酷的打击。他们从难民那里抢米,只要是能抢的财产,诸如毛毯、西服、钟表、手镯等,只要他们认为值得拿走的东西,都全部抢走。如果被抢者稍加犹豫的话,马上就被刺刀刺死。很多人成为了这种野蛮行为的牺牲品。

牺牲者达到了数千人,残暴的士兵闯入了难民区和错综复杂的民房。他们的目的是抢夺前面来过的士兵们剩下的东西。现在在城内,免遭入侵、没有受到粗暴的搜查和抢劫的家庭已经几乎没有了。

对收容所的搜查根本不加分别,被随意地重复了很多次,其结果是在没有任何军事法庭、市民也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五、六千人被枪杀了。为了省去埋葬尸体的麻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河边被枪杀的。这个数字是保守的估计。

另一个令人忧郁的事态是,对多达几千名的女性和孩子的虐待与强奸。确实,这种暴力行为在任何军队中都有发生。特别是在远东。但荒唐的是对于幼小的少女和小孩施加的虐待、砍断手足等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皇国日本的军队在武士道和自古以来的武士精神指引下所做的。^①

日本右翼经常散布一种说法,说将南京烧成废墟的大火是中国士兵所为。事实上,交通部等少量建筑和城外一些民房是国民党军“焦土抗战”的结果,而作为一个整体,克勒格尔 1938 年 1 月下旬的目击证言是清晰的:

从 12 月 20 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三分之一,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单个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地通过

^① 《外交资料:克勒格尔的私人报告》(1938 年 1 月 13 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无。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 年,第 319—321 页。

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①

施佩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参加过青岛战役,在日本当过4年俘虏。因为终日驱赶日军,救助中国难民,被安全区救济委员会同仁称为“会的堡垒”^②。作为安全区650名中国警察的领导,施佩林表示“尊重和敬佩这些中国人,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的精神。”由于工作仅陷于安全区,施佩林估计日军残酷杀害了5000—6000平民。

20万难民被赶出了自己家庭和房屋,其中有许多妇女抱着婴儿,颤抖着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吸奶。他们只是逃出了一条命,其它一无所有,他们寻求安全和保护。

新年第一天,有几个日本士兵胡作非为。一位年轻漂亮姑娘的母亲喊住我,哭着跪下求我帮助她。我跟她来到汉口路附近的一处房子里,我进屋时看到了下面的情景: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姑娘的身上,那个姑娘拼命地哭泣。我气愤得用各种语言痛骂这小子,祝他“新年愉快”。这个日本兵把裤子提在手上,转眼间就匆匆地跑掉了。

身处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中,施佩林是少数一直保持高昂情绪的外籍人士之一。他自豪地说,“为了赶走闯入安全区百姓家里野蛮强奸妇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国平民叫去的次数远远超过80次。我赶走他们毫无困难。”^③

但日军并不会因为施佩林的辛勤工作而停止他们的暴行,即使到1938年的3月,令人无法设身处地想象的暴行仍在持续,而施佩林也尽了当时最大的可能来拯救中国百姓。“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④

德国人士的报告,大多经过了陶德曼的中转签发。除了向官方、外界传播这些骇

①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8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1508/38。

② 蒋公毅:《陷京三月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③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1938年2月12日编号102的报告附件》,德国外交部档案,2718/1789/38。

④ 《施佩林给罗森的信》(1938年3月22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无。

人听闻的消息,陶德曼的笔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国民性的自然发展,这是德国视角中非常深刻的一个见解。他说:

凄惨的是日本陆军在南京所作所为。在这里,战斗的兴奋早就已经过去,此时中国士兵像兔子一样被分批带出去,然后无情地枪杀了。

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参赞)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①。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枪杀,包括欧洲人的住宅在内的房屋遭到了掠夺,中国女性遭到了强奸。据美国大使说,仅仅从美国传教士们的家里就有13名中国女性被日军部队强行带走,对欧洲人住宅的掠夺现在仍在持续着。^②

同样,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国民的影响:“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中国的未来将表明中国是否从这场‘炮火的洗礼’中找到通往民族最后复兴的力量。”^③这一发现,在美国人士的观察中得到映证,《视野》记述道:“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爱国的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④

大屠杀对新型中国国民的型塑作用,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层面。陶德曼的观察发人深思。

① 据日本“南京事件研究会”提供的资料,1923年9月,日本政府在关东大地震后发布戒严令,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人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妇及其外甥橘宗一带到宪兵队总部绞死。甘粕正彦在3年刑满出狱后,任伪满洲国协和会干部、满洲电影协会理事长。

②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文号:2722/1470/3。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44页。

③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文号:2722/1470/3。

④ 《视野》1938年6月2日第12—15页。